

美学60年

学术论文集

北京市哲学学会美学研究会 编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美学60年学术论文集

北京市哲学学会美学研究会 编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CAIJIAO DUBEN JIAI JI BIVHICHIYI HUBE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美学 60 年学术论文集/北京市哲学会美学研究会编. —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1. 7

ISBN 978-7-5656-0455-3

I. ①美… II. ①北… III. ①美学—文集 IV. ①B83-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58184 号

MEIXUE 60NIAN XUESHU LUNWENJI

美学 60 年学术论文集

北京市哲学会美学研究会 编

责任编辑 马 岩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 址 北京西三环北路 105 号

邮 编 100048

电 话 68418523(总编室) 68982468(发行部)

网 址 www.cnupn.com.cn

三河市富华印装厂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版 次 2011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15.25

字 数 269 千

定 价 30.00 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退换

目 录

回顾与展望

中国美学的历程与转向	王旭晓 (3)
中国实践美学六十年：发展与超越——以李泽厚为例	徐碧辉 (12)
光辉的里程碑——忆第一次全国美学会议	李 范 (34)
十七年电影中的女性美学——以《红色娘子军》、《青春之歌》、《李双双》 三部影片为例	李修建 (40)
百年来美育视野中的六艺研究综述	周军伟 (48)

理论与现实

回归感性意义——日常生活美学论纲之一	王德胜 (57)
中国现代美学的客观性假象问题	邹 华 (67)
多媒体艺术的由来与思考	朱青君 (80)
消费文化与当代产品的符号化	龚小凡 (90)
行走在跨界中的他者——当代中国电影作曲家创作现状呈现	姚国强 (98)
舞蹈美学体系的研究现状及整体理论建构	史 红 (112)
环境与介入——试论杜威美学中环境的观点对环境美学介入式审美模式 的影响	张 硕 (120)
从触觉看感官等级制与审美文化逻辑	魏家川 (123)
从哲学美学到社会学美学	杨道圣 (130)

艺术与审美

当代视觉艺术的文化品格	唐 骅 (141)
艺术与艺术研究中的命运主题	王志敏 (151)
北京长城的审美文化评价	王 南 (161)
一种视听格式塔：论梅洛-庞蒂的电影美学	张 颖 (172)
柏格森哲学对于德勒兹电影美学的影响	刘宗媛 (181)
宋诗七绝中的审美取向——理趣和野趣	袁钟芳 (194)
明清时期“台湾美术”的汉土美学风格——论汉土画风对台湾美术风格 的影响	丁 平 (200)

美学与教学

中国“教材式”美学理论的危机与出路——对中国美学教材现状的反思	黄应全 (209)
物化时代的审美乌托邦——一个范畴史的理解	孙士聪 (217)
群策群力，推进美育立法	顾建华 (225)
造美与审美——对美学奠基概念的哲学再思考	张 帆 (232)
编 后 记	(238)

回顾与展望

中国美学的历程与转向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 王旭晓

中国美学是由西方传入的，其基本模式，也来自于西方美学模式。中国美学学科的真正建立是在 1949 年以后，在第一次美学热潮中由国家主导定向并定型为马克思主义美学，此时更多地借鉴了前苏联美学。“文革”期间美学的学科建设完全停顿，直到 20 世纪 70 年代末期“文革”结束后重新复苏，并出现了第二次美学热潮。到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随着对西方现代美学的引进和中国艺术创作实践的推进，中国美学暴露出许多问题，受到质疑与挑战，开始了突围与转向。面对新的时代、新的形势，中国美学在转向的过程中需要给学科以新的定向。本文从西方美学学科的形成及其基本模式开始，重新回顾与审视中国美学的历程，发现现今美学存在的问题，追寻美学转向并最后转型的可能性。

一、西方美学学科的形成及其基本模式

西方自古希腊时期开始的对美的现象的关注与思考、对“美本身”的追问，在 18 世纪的欧洲，在唯理主义的哲学体系中终于形成了美学学科。那是唯理主义哲学家鲍姆加登在其对“诗”的研究中，重新认识了人类的感性，于是在 1735 年写的博士论文《诗的哲学默想录》中提出要建立一门学科来研究感性认识，这门学科可称为“Aesthetic”，即“感性学”。由此来弥补莱布尼茨—沃尔夫哲学体系的壮丽结构中由于感性的缺席而出现的缺陷。1750 年，他以此概念为其一本论述感性认识的专著命名。这本书开宗明义，提出“Aesthetic”是“感性认识的科学”^①。在上述两书中，鲍姆加登提出了感性认识的完善就是美的观点。他所指的感性认识实质上是指依赖于感觉、想象的“文学艺术”，他称之为“自由艺术”，“完善”是

^① [德]鲍姆加登：《美学》，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7 年版，第 13 页。

指内容、秩序、表现力等因素的和谐统一。

所以，鲍姆加登所建立的是这样一种科学：它审查感觉与感性认识，力图在认识体系中给予它以应有的地位；它从诗出发开始探讨，力图说明怎样达到诗的完善。既然感性认识的完善就是美，这应该也是“Aesthetic”被译为“美学”的一个原因。可以看出，鲍姆加登所努力建构的学科，既可以看做是一种哲学认识论，又更像一种艺术理论，学科的界限、对象尚不清晰，还不能说构成了完整的学科体系。但是，鲍姆加登的努力使美学在德国古典哲学中作为一个特殊部门得到确认，他因此被称为“美学之父”。

鲍姆加登所倡导的美学，经德国哲学家康德、席勒、谢林、黑格尔等人的发展深化，具有了独立、完整的体系，成为哲学中与研究知（即理性认识）的逻辑学、研究意（意志，类似于人的“道德理性”）的伦理学相提并论的研究情（即感性认识）的美学学科。

鲍姆加登初创的美学，兼有哲学认识论与艺术理论的性质。这两个方面分别为康德与黑格尔两位哲学大家开拓、深化、发展和完善，建立了美学的基本模式。

康德的《判断力批判》着重分析了感性认识能力与主体的心理机能，把审美判断力（想象力与悟性）作为联结感性与理性的中介，并推及艺术，提出了“审美判断”、“鉴赏”、“美感”、“崇高感”等一系列概念，从哲学认识论角度建构起以美为中心的完整的美学体系。

黑格尔则从历史与逻辑统一的高度，着重分析了感性能力的产物——艺术与艺术的历史，把艺术作为绝对理念产生和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环节，对艺术的本质、艺术的演变、分化、艺术类型、艺术体裁等作了深入的分析，同样建构起了一个以艺术为中心的完整的美学体系。因此，他虽然把自己的美学著作定名为《美学》，但实际上却是“艺术哲学”。他声明，“我们的这门科学的正当名称却是‘艺术哲学’，或则更确切一点，‘美的艺术的哲学’”。^①

1879年，德国冯特在莱比锡建立实验心理学实验室，心理科学开始了独立和发展的现代进程。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以黑格尔哲学及美学为代表的形而上学体系的被批判，德国哲学家费希纳在实验心理美学建立的基础上提出的以“自下而上的美学”来代替“自上而下的美学”，即以审美经验的研究取代传统的纯哲学思辨的美学意见得到认可，从方法论上引发了美学研究的革命，使西方美学

^① [德]黑格尔：《美学》第1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3—4页。

从古典的形态进入了现代的形态。此时，美学被看做是对审美心理或审美经验的研究。德国立普斯的“移情说”，谷鲁斯、费肖尔父子、浮龙·李的“内模仿说”和瑞士布洛的“心理距离说”，都对美学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一般来说，伴随现代心理学的发展都有相应的心理美学学派产生。这也就是美学研究的第三种模式。

二、从西方到中国：美学的中国化行程

从学科的角度看，美学建立于西方。美学由西方传入中国，时间大约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当时，中国已经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许多有识之士为了反对封建专制主义和军阀的腐败政治，纷纷从西方寻求救国的道理。一些教育家、学者接受了席勒的美育思想，也企图从美育中寻求救国、改革社会的途径和方法，形成了一股重要的美育思潮。由于美育与美学不能截然分开，在引进美育的同时，也就是引进了美学。可以说，中国的美学，最初是从美育角度引进的。其代表人物为梁启超、王国维和蔡元培。

梁启超是中国最早引进西方美学并把它与中国传统美学思想结合起来的尝试者，也是近代中国美育思想的开启者。他首次在中国提出了“趣味教育”的概念。所谓“趣味教育”，实质上是情感教育或美育。

王国维对美育在教育体系中的特殊位置作了阐述，指出了它与德育、智育的区别与联系，第一个提出要把美育列入教育方针。

之后，蔡元培对美育思想作了更为系统的阐发，是近代中国美育思想的集大成者。蔡元培明确提出了美育的概念及目的，并明确了美学与美育的关系。他说：“审美教育者，应用美学之理论于教育，以陶养感情为目的者也。”^①

20世纪30年代起，我国涌现了一批从事美学研究的学者，如宗白华、邓以蛰、朱光潜等，他们都是在外国学习接受美学然后研究并介绍到国内，他们的研究基本上都是借重西方美学的研究方法与成果，结合中国的传统文学艺术，或构筑体系，或探索中国的审美与艺术精神。

与此同时，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获得节节胜利，并得到广泛的传播，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已经不适合革命大潮中的中国，其中就包括美学研究中强调脱离现实、把玩自我的观念，因此，鲁迅、瞿秋白等人都在呼喊引入马克思主义美学，有的学者也开始尝试以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为方法论原则，构建新的美学体

^① 蔡元培：《蔡元培美学文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74页。

系。蔡仪在 20 世纪 40 年代就形成了以马克思主义哲学观——唯物反映论为基础的美学思想。

这是美学进入中国的时期，也是中国美学的初创期。在这个时期里，梁启超、王国维引进了西方美学的部分概念和内容，王国维还倡导在大学的哲学、中文、外文等系开设美学课。蔡元培使这一主张在北京大学得到实现。他的“以美育代宗教”的主张至今仍有影响。

但从学科的角度看，朱光潜在 1932 年写成的《谈美》最全面地展示了中国美学理论初建时的形态。

朱光潜写下《谈美》时，正是国家危急存亡的年头。他在开场话里说：“我现在讲美，正因为时机实在是太紧迫了。……我坚信中国社会闹得如此之糟，不完全是制度的问题，是大半由于人心太坏。我坚信情感比理智重要，要洗刷人心，并非几句道德家言所可了事，一定要从‘怡情养性’做起，一定要于饱食暖衣高官厚禄等等之外，别有较高尚较纯洁的企求。要求人心净化，先要求人心美化。”^①在这儿，朱光潜没有把美看做是风花雪月，不是精神奢侈品，而是可以洗刷“太坏”的人心的“清凉散”，是一种“较高尚较纯洁的企求”，是建立“净化”的理想人格的前提。他的美学理论同样有着明显的为救我民族而建立的宗旨，也可以看做是从美育角度引进的。

《谈美》由 15 篇看似信手写来、随意挥洒的小文组成，看上去好像是《文艺心理学》的缩写本，但实际上又不完全是。正如朱自清先生在《谈美》的序中所说，它“自成一个完整的有机体；有些处是那部大书所不详的；有些是那里面没有的。——‘人生的艺术化’一章是著名的例子；这是孟实先生自己最重要的理论。”^②这里指出的《文艺心理学》中所不详的和那一章“人生的艺术化”的增加，实际上是朱光潜对于自己在《文艺心理学》中没有专门论述的美学思想的出发点与指归目标的阐明。而这种阐明，正是朱光潜美学的核心与主线。朱光潜用这条主线，把他所接受的西方美学和文艺批评思想，特别是克罗齐、康德、尼采、立普斯、布洛、柏格森等人的学说加以改造、吸收，形成了自己完整的美学思想与理论体系。

这个体系由三个主要部分组成：美从哪儿来，美是什么及美的特点。美从哪儿来？朱光潜认为，美产生于人的美感经验活动。那什么是美呢？朱光潜提出，

① 朱光潜：《谈美·谈文学》，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 年版，第 12 页。

② 朱光潜：《谈美·谈文学》，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 年版，第 9 页。

“它是心物婚媾后所产生的婴儿”，^① 是一种形相。形相就是美，就是艺术品。因此，美的特点是创造，所以，美是属于艺术的。因此，朱光潜的《谈美》通篇谈的是美，但他认为美学的研究对象是艺术，美学应该是艺术哲学。可以看出，朱光潜所吸收的西方美学模式是属于第二种，即认为美学研究艺术，美学就是艺术哲学。然而，他的《谈美》的理论基础却是他写的《文艺心理学》。由于朱光潜的文艺心理学的理论构架是来自于他对当时西方审美心理学的接受，而《谈美》的下笔行文几乎全是中国化的——中国化的语言、中国的传统、中国的诗词、中国式的体验，等等，因此最明显地表现出了中国美学理论初建阶段的特点：以西方心理美学理论为骨架，以中国文艺理论为血肉。

三、中国美学的定向与定型

1949年之后，美学开始作为一门正式的学科被我国学界所重视。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至60年代中期(1956—1965年)出现了美学研究的第一次热潮，表现为当时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一场美学大讨论，讨论的中心在于美学的对象、美的本质、美感、自然美、手稿中的美学思想等问题。

这次讨论产生于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即新中国建立之后中国现实社会的政治变革时期，相应的学术研究也必然被要求符合政治变革与意识形态变革的需要，特别是要求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所以，这次美学大讨论的目的是清理旧的唯心主义美学思想，在美学中确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研究风气和理论意识，建设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美学。这就注定美学要批判唯心主义美学、形而上学和资产阶级利益。这次美学大讨论可以说是中国美学理论的定向，它确定了建立马克思主义美学原理的基础，也就是要以马克思主义最根本的理论特征和哲学基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来建立中国的美学原理，它也成为近代以来中国美学的终结和当代美学的开端。

当中国美学的发展方向定为建立马克思主义美学时，中国的美学模式必然取自于前苏联模式，因为当时苏联的美学模式被认为是马克思主义美学。

前苏联的美学研究以建立马克思主义的美的本质理论为主旨，把美学的基本问题定为美的本质问题。由于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没有直接论述过美的本质问题，所以只有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原理来创造性地建立马克思主义的美学理论。因而，坚持唯物主义反映论的自然派强调美在客观事物本身，美感是对美的

^① 朱光潜：《谈美·谈文学》，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57页。

反映；从历史唯物主义中提取了哲学模式的社会派强调美是客观性与社会性的统一，事物的社会性使自然事物获得美。前者的代表为蔡仪，后者的代表为王朝闻与李泽厚。

自 20 世纪 50 年代的美学大讨论起，蔡仪执著地把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导入美学研究，构成了其完整的美学体系。这个体系强调现实美是客观存在，强调美感是对美的反映，强调艺术美是对现实美的反映。因此从整体上看，他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自然派，是客观论美学。

王朝闻也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方法，以美的本质为基本线索来构建美学体系的，从整体上看，也是客观论美学。但他更强调实践的作用，认为美来源于实践，美是社会实践的产物，人们的审美意识是为人们的社会实践所决定的对于客观世界的美的反映，艺术是审美意识的集中表现，同样是对客观世界的美的反映，而审美意识是可以反作用于社会实践的。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社会派，是在中国美学中至今仍占主导地位的“实践美学”的滥觞。

然而，实践美学的真正的代表人物应该是李泽厚。在 20 世纪 50 年代的美学大讨论中，他是客观性与社会性的统一论派的代表。他强调人类实践的作用，提出了美是“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观点，引起很大的反响。之后，他又提出美是“自由的形式”，是人类实践的历史成果。他的实践观点实际上成为 20 世纪 80 年代美学复苏后人们建构美学原理体系的核心观点，以美的本质问题为基本问题的美学体系基本上都是围绕着“美是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这一观点而展开。

因此，在这一阶段，不仅唯心主义美学思想被彻底地排除，就连朱光潜的美学也因为强调人的主观性而被等同于唯心主义，受到冷落。

在这个阶段，中国的美学理论既不同于西方美学，也不同于新中国初建阶段的美学，而是充满了浓郁的马克思主义气息。当然，它与前苏联的马克思主义美学也有不同，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即以西方美学的三个模式所涉及的美学问题为美学研究的范围，以美的本质问题作为基本问题或线索，用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特别是实践观点对美学的本质问题进行解答，并以此为基点解决美感与艺术的问题，从而形成中国美学的体系。

在 20 世纪 80 年代，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中国美学出现了第二次热潮。这次热潮也伴随着当代西方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成果以及当代西方美学理论的大量引入，因而美学研究急需解决许多认识上和方法上的困难，解决当代中国美学与西方相参照而呈现的“滞后”，把握美学发展的时代进程。

在第二次美学热潮中，李泽厚更强调的是对审美心理的研究，他认为，任何

科学从基本理论到具体应用，有一系列的中介，美的本质（工具本体，社会存在）不能直接解释一切具体的美的现象（心理本体），美的本质不等于美的对象。审美现象必须结合美感来谈，所以要研究审美心理，要建立新感性。建立新感性就是建立人类心理本体，也就是从人类学本体论来看美感。新感性的建立是历史的构建，是自然人化的结果，因此新感性有社会性的特点。因此，李泽厚的美学思想表现出了对人的重视，对主体性的重视。然而，李泽厚所重视的人，主要还是作为人类集体的人，是“大我”。他虽然已经看到个体自我即“小我”在美学研究中的巨大意义和价值，但他的整体理论体系所依据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和人类学本体论哲学却使他的美学走不出重“大我”而轻“小我”的樊篱。

可以说，这时的美学，仍是 20 世纪 50 年代所定型的模式。

四、中国美学的转向

在第二次美学热潮中，美学部类迅速扩张，美学问题大量提出，加上普遍采用的许多新方法，既促进了美学在广度和深度上的发展，也产生和积累了许多问题。当时已经构建的中国美学体系，很快就表现出其无视亦无法解决现实存在的美的问题并缺乏内在的逻辑性的缺陷。美学理论从观点到体系都受到了不断的质疑和批评，自 20 世纪 80 年代晚期起，中国美学研究就有了有意识的突围与转向。

突围最明显地表现在在建构新的系统的美学体系时，突破以美的本质问题为中心线索的构架方式，代之以可描述的、实证性的逻辑起点和中心线索。不仅有审美经验，还有审美活动、审美价值等。

美学在转向。所谓转向，就是美学研究中心的转变。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美学转向的呼声日高，转向的实际行为也竞相出现，那就是美学研究的重点问题和中心问题的多元化。这种转向最鲜明地表现在“新实践美学”与“后实践美学”中。

中国的“新实践美学”与“后实践美学”有着特定的意义，它是对应着占主导地位的“实践美学”而提出的，表明一种想要超越实践美学的倾向。诸如模糊美学、审美人类学（或称人类学美学）、生存（超越）美学、体验美学、生命美学都是属于这个序列。它们共同的特点，就是提出与实践美学不同的美学研究重点问题与中心问题，或使用不同的方法。像模糊美学是以系统论方法、耗散结构、模糊数学等方式进行的美学研究，它对美学提出的主要观点是认为美学的特点就是不确定性与整体性，即模糊。生存（超越）美学特别强调超越实践美学中提倡的实践的群

体性，要突出个体性，强调审美的超越性。而生命美学强调以非逻辑、非体系、非西方话语、无概念等概念来进行美学研究，中心概念是审美活动，而对审美活动的界定又是特定的。

实际上，在这个时期里，美学的学科体系框架已经呈现出一种开放的态势，即从一元结构向多元取向转换。理论视野进一步开阔，理论方法多元开放。这些新的角度与方法的采用，活跃了美学研究，拓展了美学研究的问题域，也提供了多元化的研究进路。

然而，多元化的美学研究却暴露出来一个问题，那就是至今还时不时出现的对美学学科存在合法性的质疑。这种质疑在我看来恰恰是基于美的本质问题被消解的事实，因为原本的美学都是以这个问题为基本线索和中心的，这个问题的被消解或被忽略导致了整个美学学科的科学性与合法性的动摇。稍远一点说，美育在我国所处的尴尬地位与美学学科的处境密切相关。

但我却是以欣喜的心情来迎接这样的事实。因为这正好表明，美学研究正在转向的过程中。美的本质问题被忽略抑或被放弃可以看作美学转向的一种表征。同时我也是以凝重的眼光来看待这样的事实。因为在这转向中如何定向是当前美学所面临的十分重要的问题。

从中国美学初建时定向与定型的过程回顾中，可以发现定向对于一个学科建设的重要性。当时中国美学的定向是由执政党提出，是由国家意识形态建设的需要所决定，那么现在的转向必然会产生一个问题，那就是由谁或由什么为现在美学的转向定向？或者说，美学向哪个方向发展才会是合理的和科学的？

在当今中国美学多元化的局面中，已经建立起来的有马克思主义特点的美学仍然占有主导地位。这种主导地位不是来自于政治和意识形态的需要，而是来自于其自身的学术性、逻辑性和生命力，因为它们已经开始脱离美学所不应有的过强的政治性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依附，内容和形态在发生较大的改变。它们已经融进了许多价值学和人学的内容，还在不断地吸收新的思想、新的方式。这是真正属于美学的路程的开始，换句话说，美学开始解决自己应该解决的问题。对于人类为什么会有审美活动，如何解释审美过程、审美现象等围绕人的一种特殊方面展开的研究，是符合美学的学科本性的。这样建立起来的美学学科会具有普适性，会具有巨大的理论力量。可以说，美学的定向首先应该是学科本身为自己的定向，美学要做自己应该做的事情。

而确定哪些是美学应该做的事情，需要美学不断地给自己提问，从现实中发现问题并寻找解决问题的途径和方法。这同样是为美学定向。

自 20 世纪 90 年代起,中国经济全面市场化,社会急速转型。进入 21 世纪,经济全球化的浪潮冲击着社会的各个方面,提出了整个社会都要面对的现实问题。在经济全球化的同时出现了“奥运经济”、“审美经济”,出现了消费的审美化趋势,这就给美学学科提出了全新的课题与问题。

全球化虽然主要是指经济的全球化,但必然给文化以重大的影响。在全球化的过程中,发达国家的自然科学知识、先进科技、物质文明成为人类可以共享之物,社会科学、人文科学中的不少方面也在互相借鉴。文化呈现出一种全球性的态势。这种全球性的态势使各个民族能学习更先进的事物,在学习中导致对现实生活的反省,引发政治和经济制度的改进,同时使文化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势。特别是生活中大量的不需要制度规范的文化传统,在全球化时代并没有统一规则,就给人提供了更多的选择。艺术、审美就是这样。这同样给美学学科提出了课题与问题。

不仅是经济与文化,还有人们的日常生活、社会的教育,等等,一切与审美相关的方面,都会提出需要美学回答的问题。美学要能不断地解答现实提出的问题并指引正确的方向,同时又要不断地反思并完善现有的理论,使其有旺盛的生命力。美学必须这样给学科定向。

美学的转向带来的是美学转型的希望。

所谓美学的转型,就是出现新形态的美学或美学形态的整体性转变。也就是说,美学研究要在理念、研究范式、基本问题、体系结构、逻辑线索、话语方式等方面,都发生较大的改变。

这样,转型后的美学就会有强大的理论力量,不仅能够解释人类的审美现象与审美规律,而且能够提供有中国特色的审美价值观和审美标准,使中国人的生存状态和精神生活审美化,从而使人类社会进一步和谐发展。

转型后的美学还应该具有世界性的学术眼光,能够参与国际上有关美学问题的讨论与对话,而且是以自身的独特性和鲜明的中华民族的民族特色来参与这种讨论与对话,让中国美学为世界、为全人类作出应有的贡献!

中国实践美学六十年：发展与超越

——以李泽厚为例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 徐碧辉

众所周知，实践美学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产生的最重要的美学理论成果。中国实践美学有众多代表人物，其中，以李泽厚的实践美学最具有典型性，影响最大，遭受批评也最多。除李泽厚之外，还有朱光潜后期、蒋孔阳、刘纲纪、周来祥、杨恩寰、梅宝树、李丕显、杨辛、甘霖以及中青年一代学者，如朱立元、张玉能、邓晓芒等。因篇幅所限，本文只就中国实践美学最有影响的代表人物李泽厚的实践美学作一番描述与分析，其余的，只能另文讨论了。

一、实践美学的发展历程

（一）50年代后期—60年代前期：实践美学的萌芽与雏形

中国实践美学观点萌芽于20世纪50年代末期的美的本质大讨论。李泽厚用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实践观点去解释美的本质，提出，美既不是客观的也不是主观的，而是客观性和社会性的统一，被称为社会实践派，形成实践美学观点的萌芽。

60年代以后，李泽厚的美学观完全转向了实践论。他强调，“只有遵循‘人类社会生活的本质是实践的’这一马克思主义根本观点，从实践对现实的能动作用的探究中，来深刻地论证美的客观性和社会性。”李泽厚给美下了一个颇具代表性的定义：“就内容言，美是现实以自由形式对实践的肯定，就形式言，美是现实肯定实践的自由形式。”这一表述后来成为实践美学对美的本质的经典表述。

60年代，李泽厚虽然仍然强调美的客观社会性内容，但已经把讨论的重点转向了美的客观社会性的哲学根基——自然的人化问题，并基本上提出了自然人化的核心思想——自然和人关系的改变，自然不再作为人类的仇敌，而是在实践